

〔日〕铃木贞美 著

魏大海 译

作者以批判的目光

回顾了日本近、现代民族主义的曲折历程

——由日本国民文化的形成到战争时期的「超越近代论」，

进而涉及战后民族主义之本质。

本书一步步颠覆了

日本战后保守派、进步派陷入误区的历史认识。

总主编 冯天瑜 〔日〕刘建辉
东亚文化研究书系

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〔日〕铃木贞美 著

魏大海 译

总主编 冯天瑜 〔日〕刘建辉
东亚文化研究书系

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/(日)铃木贞美著;魏大海译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08. 4

东亚文化研究书系

ISBN 978-7-307-05921-4

I. 日… II. ①铃… ②魏… III. ①民族主义—研究—日本—近代 ②民族主义—研究—日本—现代
IV. D093. 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64683 号

NIHON NO BUNKA NATIONALISM

by Sadami SUZUKI

Copyright © 2005 Sadami SUZUKI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HEIBONSHA LIMITED, PUBLISHERS, Tokyo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EIBON-
SHA LIMITED, PUBLISHERS, Japan through DAJIANGSHE, Japan

此书经有限会社大江社代理,由株式会社平凡社授权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17-2008-026 号

责任编辑:唐 伟 责任校对:黄添生 版式设计:詹锦玲

出版发行: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wdp4@whu.edu.cn 网址:www.wdp.com.cn)

印刷: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

开本:950×1260 1/32 印张:7.125 字数:175 千字

版次: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05921-4/D·799 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;凡购买我社的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总序

冯天瑜

20 世纪初叶，文化传播学派代表学者德国人格雷布内尔（F·Graebner 1877 ~ 1934 年）与奥地利人施密特（W·Schmidt 1868 ~ 1954 年）提出“文化圈理论”，认为世界上存在若干文化圈，每个文化圈包含一定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共有成分。此说庶几反映世界文化史实际，故近一个世纪以来逐渐被普遍采用。

“文化圈”作为文化传播造成的文化场，指具有相近文化特质、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，往往由某一先进民族或国度组成“中心文化丛”（或曰“文化核心区”、“文化源地”），以其首创的文化播扬于周边地区（或曰“文化边缘区”、“文化受容地”），在核心与边缘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圈。当然，这种中心—边缘关系并非固定不变，而是在历史进程中有所异动的。时下学界的普遍看法是：希腊—罗马文化、从希伯来到伊斯兰时期的闪族文化、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，都曾是具有丰厚积淀与强大扩散力的文化源地，以其为核心形成各自的文化圈。另外还有一种更具全球视野的划分：东地中海文化圈（以后扩展为北大西洋文化圈，俗称西方文化圈）、西亚北非闪族文化圈（今伊斯兰文化圈）、

南亚文化圈、东亚文化圈、中南美印地安文化圈。

文化圈可从地理、民族、语言、宗教、民俗等多种角度划分与命名。上述“东亚文化圈”以地理属性得名，其范围约指东亚大陆及周边半岛和岛屿，大略包括今天的中国、朝鲜、韩国、越南、日本。从体质人类学言之，这一文化圈居民同属蒙古人种；从文化人类学言之，这一文化圈共同拥有汉字汉文（故有“汉字文化圈”之称）、儒学（故有“儒学文化圈”之称）、华化佛教、中国式律令制度，等等。

拥有若干文化共相的“东亚文化圈”，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形成、发展起来的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，中国是东亚最先进、强大的国家，占据文化高势位，是文化输出国，中国的水稻、粟、麦栽培技术，冶金、养蚕、缫丝技术等传入越南、朝鲜半岛、日本列岛，与之相随，前述汉字文化的诸多门类也播扬周边列国。诚如唐太宗李世民（599～649年）诗称：

指麾八荒定，怀柔万国夷。（《幸武功庆善宫》）

车轨同八表，书文混四方。（《正日临朝》）

越、朝、日等东亚文化圈周边诸国，皆有自己辉煌的文化创造，同时也都接受中国文化多方面的影响，以日本为例，曾一再派出“遣隋使”、“遣唐使”，昭显了东亚文化圈边缘带研习核心区文化的热情与执著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（1866～1934年）强调，日本是中国文明圈的一员，他打了一个著名的比喻：

日本文化是豆浆，中国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卤水。（《日本文化史研究》）

时至近代，东亚诸国都面对工业化西方的来袭，西学东渐构成东亚文化圈的新命题，东亚诸国在19世纪中末叶先后进入社会及文化近代转型过程。比较而言，日本较迅速地吸纳西方近代文明，实现近代化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成为东亚文化圈的先进国和新的文化源地，中日文化势位对比发生异动，文化传输的主流方向逆转：古代是中国—日本，近代是日本—中国，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留日热潮，便是中国人以日本为中介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一种努力。进入现当代，中、韩等国现代化取得长足进展，渐成迎头赶上之势，在新的文明水平上，东亚诸国发生着空前深刻的文化互动，东亚文化焕发出新的光耀，对全球文明的影响力也日益巨大，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成为当下世界最为强劲的两大大文化圈，当然，其他文化圈的影响力也不可忽视。

概言之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东亚文化圈诸国互为师友，由于文化互动而彼此受益。在近代，因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而与东亚文化圈其他诸国严重对抗，造成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劫难。郭沫若先生曾把中日两国关系概括为“两千年玉帛，一百载干戈”。反顾东亚文化生成、发展的历程，我们有充分理由宣称：和则互利，斗则两伤。化干戈为玉帛是时人的使命，也正是本书系的基旨所在。

笔者近十余年来多次参加以东亚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，并从事相关合作研究，结识东亚列国学者，并研习其论著，亲炙东亚文化丰富的内涵，渐以推介东亚文化为乐事。2004年夏至2005年夏，笔者访学于日本京都的“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”，武汉大学出版社邀约笔者选取一批反映东亚文化的日文书籍，译介给中国读者。受命后笔者即与“日文研”刘建辉博士从近二十年出版的相关论著中择得八种，延请译

者，经两年劳作，成此“东亚文化研究书系”。

本书系着眼东亚文化圈生成与发展的曲折多致历程，所选择的论著，或总论整个东亚文化圈诸国间的文化互动（如池田温的《东亚文化交流史》、福井文雅的《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》），或用力于东亚文化圈某一国度的文化史（如铃木贞美的《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》、森贞彦的《〈菊与刀〉新探》、上垣外宪一的《日本文化交流小史》），或研讨东亚文化圈内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史（如古濑奈津子的《遣唐使眼里的中国》、阿部洋的《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》、刘岸伟的《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》）。就浩博的东亚文化而言，这些论著所述当然只是冰山一角，却也可以一斑窥豹、以蠡测海。

本书系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“近代术语的生成、演变与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”的成果之一。

2007年10月24日拟于武昌珞珈山

。其语言基础系由本系五出，命其

译 序

铃木贞美是当今日本最活跃、最重要的人文学家之一，其尤为重要的代表性论作是1998年刊出的《日本的“文学”概念》，围绕于此，他长期致力于核心概念之历史沿革的辨析与研究，在搜集大量专业杂志、综合杂志记事资料的基础上，对日本的近、现代文学史进行了大胆的重编，其卓越的学术努力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，富于启示性的论著、论考亦被频频翻译为外国语或为外国学者所引用。此外，相关学者皆知晓，铃木贞美指导下的许多年轻研究者，也纷纷完成了博士论文或发表新著。

而“贞美”一名，在许多中国人听来仿佛是女性，实际上却是一位年届“耳顺”的男性学者。他已在中国做了近20次学术讲演。《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》却是他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译著。

在日本与中、韩两国间频频出现纠葛的特定时期，铃木贞美这样一位日本学者从学问的角度整理了“民族主义”一词的概念，同时富于启示性地、以凝缩的形式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即能否重新定义日本近现代的历史认识，这是本书值得注目的第一个要点。

当然这里的一个前提，是铃木贞美希望、愿意对20世纪前半期的日本帝国主义做出最为彻底的反省。本著开篇即以学

术性的冷静态度，对恶名昭著的日本《新历史教科书》进行了批判。在中国，关心日本的知识分子十分熟悉战后日本进步的知识分子如丸山真男、加藤周一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大江健三郎，了解他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反省。但铃木贞美与他们还不能一概而论。因为本书中，他对前述日本知识分子的反省方式持有尖锐的批判态度，认为他们的反省方式存在严重的不足或误区。不妨说，本书从根本上批判了日本之前的种种历史认识，著者认为，要在亚洲各国间建立真正的良好关系，就有必要建立新的历史认识。为此，本著不断展示在日本亦鲜为人知的、重要的历史资料与思想，且分别解说了其中的意义。

例如，在日本和中国其实一直将某种现象看做常识，即19世纪中叶日本开始汲取西洋文明，并走上了西洋化的发展道路。以鲁迅为代表的众多留学生曾经留学日本也是事实。然而，铃木贞美十分肯定地认为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他认为，明治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仍旧是在中国语言传统概念的基础上，开始汲取西欧的近代概念，同时形成了相异于西洋的文化。铃木贞美举证了一个世所罕见的事例，即当初的日本文学史竟是以汉语和日本语两种语言写成的。诸如此类，读者或闻所未闻，而一旦发觉那是事实，便会成为新的常识。重要的是，铃木贞美书中标明的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的西洋文明汲取方法，亦可适用于其他概念。

如今，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总在讨论“超越近代”。铃木贞美却说，日本的知识界其实早就涉及了此类问题，诸如近代战争、都市化和环境污染等。他也说到，日本的所谓“超越近代”曾被归结为反西欧帝国主义的思想，并在国际政治欺瞒性的运用中鼓噪为臭名昭著的“大东亚共荣圈”思想。

这个论点，与铃木贞美长期关注的、有关日本近现代思潮核心的大正生命主义论，皆是著者富于独创性的见解。本著的关键在于，探究当时日本的民族主义基本构成，说明本国利益优先、悍然侵略中国的日本民族主义乃是假普遍主义、亚洲主义之名散布的幻想。

这些问题，在中国老一代日本研究者中似亦很少涉及。简而言之，本著囊括的许多问题探究，致力于颠覆旧有常识而确立文化史的新的基本认识。作为译者，吾人翻译此著时也曾犹豫再三。反复研读后，才在几个基本问题上理解了著者的真意。重要的是，铃木贞美的几乎所有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——拘泥于陈旧思维方式的研究者除外，在期望打破传统知识结构、推出新的研究成果的研究者中，一直受到普遍的欢迎。本著贯穿了同样的研究姿态，即基于国际性视野，从根本上观察、考察日本曾经走过的道路。

下面的几个问题，亦需提请读者注意。

（一）应当说，本译著只是如实翻译了原本面向日本读者的著作。有关中日战争战死者人数等，著者的例举根据是日本的百科事典类记述。这一点，显然与中国读者了解的常识差距很大。

（二）有必要对铃木贞美的学术态度给予特别的关注，在研究中，他首先是将各种思想性立场彻底地相对化，而后才进行比较和探究。他经常给一些说法打上引号（诸如“根据……”、“所谓……”），此类表现统统表明了著者的前述态度。例如在译著中第15~39页，著者写到相对于“国家主义”的“国民主义”被称做所谓“健全的”民族主义。著者强调这里的目的只是为了便于比较和探究，即对照“国际主义”之类相关概念，将民族主义的各类形态相对化。著者表

明并非简单认同“健全”的说法。

(三) 本著乃面向日本一般读者的书籍，书中的叙述尽量做到平易而简洁。例如本著提到，其实是在进入 20 世纪以后，才将“闲寂”、“空寂”、“幽玄”等源自禅宗影响、兴起于日本中世的美学，视为体现“日本特质”的传统。书中第 130、133、134 页仅以约一页的篇幅，简单描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做出的某种归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《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》原著刊行不到一年后，铃木贞美又在几位年轻学者共同研究的基础上，详尽整理、出版了厚达 538 页的研究力作《闲寂、空寂、幽玄——“日本传统特质”的形成历程》（译者现在铃木贞美所属、位于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作客研，抵日不久便看到京都新闻和京都电视台对铃木贞美做了相关专访）。可见本译著所论具有坚实的学术依据。反之令人担心的却是，倘不了解前述依据，或将无法全面、深刻地理解著中的内容与观点。著者表示，详细展开本著内容的相关论文，也将陆续翻译为中文并刊载于相关的学术杂志。

(四) 倘若读者仍旧感觉本著难以理解，想必那是因为读者尚不习惯铃木贞美运用的新的研究方法。简单说来，其研究方法就是对任何思想，都在理解其主体性立场的基础上进行客观的批判。

铃木贞美经常提到研究者“自我相对化”的重要性。不仅是研究对象，研究者自身也要相对化。对于这个问题，铃木贞美曾经做出如下回答，他说：“各国学者若将自己之前习得的立场、方法绝对化，自以为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，便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。不妨说，有必要暂且跳出自己的思维方式，与他者进行国际性、历史性的比较探究，进而锻造出更加完善的思维方式。只有在建立了这样的思维方式之后，方可致力于旨

在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理性的对话。”

继而，他又做了更加具体的说明：“在中国，一个普遍性的认识是进行了14年的抗日战争。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，有必要看到另外一个历史，那就是发动了侵略战争的日本当权者，最初打出的惟一的战争口号是‘防共’，结果却没有打破国共的合作，相反美英的责难一浪高过一浪，于是当权者又推出了‘大东亚共荣圈’的构想，开始了与美、英、荷兰之间的战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之前反对侵略中国之侵略战争的日本知识分子中，竟也出现了赞同战争者，认为‘大东亚共荣圈’的说法尚可接受。就是说——值得注意的是——当时基于各种立场、行为生活在日本、中国或伪满洲国的人，无论赞同还是反对，随着国际形势和政治权力打出的口号发生变化，其思维方式和态度也都发生了变化。那么以结果和现在的基准，单方面地评判生活于过去的人们，无视他们的立场与想法，也是对过去的尊重。对于历史不能贴标签，不是黑就是白，对于错误的思想应当探明其错误的根源——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？只有进行这种深入的探究，才能真正地以史为鉴。这才是历史学的真谛所在。”

铃木贞美的此般说法无疑是正确的。进而言之，铃木贞美亦通晓流行于欧美的新的研究方法。不过他反对原样不变的照搬。因为以那样的方法照搬于东亚，便将频频落入错误的陷阱。辨明东亚的现实，首先须在东亚的立场上批判欧美的方法，进而创造出更加有效的研究方法。本著中的“传统发明”论，应用的原本是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家们编织的方法，铃木贞美首先阅读了他们的著作，然后在批判的基础上令前述方法获得新的生命力。所以话说回来，必须基于世界性视野，才能感知铃木贞美的批判力和创造性。

那么铃木贞美的方法论和学术态度是如何建立的呢？事实证明，他是在日本近、现代文学的研究中逐步形成了前述学术态度。其一以贯之的研究方法，首先是面对大量的作品和相关批评，然后深入挖掘作者的立场，进而细致观察伴随时代变化的、价值观念的嬗变，最后基于现在的立场完成新的批评。铃木贞美表示，他非常欢迎读者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其论著进行批判。因为思想性立场自会有差异，但批判者的态度更加重要——只要勿将一己的意见绝对化，相互间的批判是非常重要的，在交流中，双方的思想性立场均将获得提升。他也强调，相互理解和相互批判的自由是理性交流的原则，在这种交流中，彼此的立场都将发生变化，双方也将大幅地增加共通性。

总之，本著作者铃木贞美正是基于前述立场方法的、新型的日本知识分子。本译著展现的也是日本新型研究开拓者的努力之一。

翻译本著的目的在于将中日间的相互理解推至新阶段，且大力推动健全形式下的文化交流。本著的韩语译本也将在韩国刊行。最后需要说明的是，翻译中关于原著笔误或印刷错误的订正出自铃木贞美本人。

魏大海

2006年11月25日

于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

——中译本序言——

本著的出版背景乃冷战体制崩溃后的新的世界形势，值此，仍旧有人固守冷战时期的价值观，在高涨的国际性民族主义刺激下，不时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狭隘性。在日本，围绕民族主义的争论亦错综复杂，其方向趋于暧昧。正是于此般状况下，笔者以一般性书籍的简便形式刊出此著。

本著开篇先对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整理，而后依次展开诸多关于日本民族主义历史变迁的新观点。

首先需要确认，近代国家乃国民国家之构建，国民国家则是在一种法律体系下统合所有类别国民的机器，时常表现为多民族复合之状况。国民国家的中文译词为“民族国家”。但在日本，“民族国家”多指称单一民族或单一国家之理念。为此，日本一般不采用“民族国家”的说法。日本曾有灭亡阿伊努民族的国家政策，在冲绳施行过残酷的压迫，同时拥有很多朝鲜族侨民。由此可见，近现代日本是所谓复合性国家。

尚需说明，著中涉及的某些数字如南京大屠杀日军杀戮中国人的人数等，乃为日本历史学认定的数字，与中国方面的确认多有差异。今后，中日双方的历史学者将依据确定的史料，使双方的认识逐步接近。

在历史认识问题上，重要的是面对具体的史料，进而逐步达成中国、日本双方研究者的相互确认。笔者认为，思想·文

化史方面的研究处在尤其滞后的状况中，促进史料的发掘与公开乃当务之急。

另外，在历史认识中尚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视点，即近现代中日关系的进展密切关联于国际形势。

——本著的基本思路乃立足当今、回顾历史，不是以绝对化而是以历史相对化的研究方法，面对本国民族主义的历史变迁。相信这样一种研究态度，在中国也将获得普遍认同，而只有在此基础上交换研究成果，才能推进相互间的理解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冀望双方研究者的共同努力。

最后，本著乃简便的一般性书籍形态，无法深入展开细致的讨论，而专家需要多方位的争论。

为此需要说明，与之相关的更多考察展开于新著《多重危机下的生命观探究》（日本作品社，2007年版）中，必要时不妨参照。

铃木贞美

2007年5月

——前言——

政治、经济领域的民族主义追求的是国家利益，它会因政策的变化而时时发生变化。相反，文化中的民族主义却具更加强韧的生命力，常常历经数十年、数百年而不变。例如在 18 世纪末，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复国之前，曾被世界列强分割为 3 部分，在地图上消失了一个世纪以上。在此期间，不断维系其民族意识的是语言（波兰语）、宗教（天主教会）和浪漫派艺术。密茨凯维支的诗歌、谢恩凯维奇的小说、肖邦的音乐……在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教会都是抵抗斯大林政权的主要力量，因而“没有天主教便没有波兰人”的观念，仍旧体现为如今波兰的主流性文化氛围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，日本强烈反省了战时的思想基础且修改了宪法。然而日语并没有为外国语替代，国语课上教授的课程仍旧是日本的文学艺术。传统艺能亦得以存续，各种体育文化也走上了国际舞台。

笔者 1999 年访问了开罗，柔道在当地十分普及。在 1984 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，埃及的柔道选手穆罕默德·拉西万是个日本通，他在决赛中战胜了日本的山下选手，事后却说：“我知道山下受伤了，所以没有全力发挥，我知道那才是武士道的真谛。”

在日本的相扑跤场上，外国力士已活跃多年。剑道亦不甘

落后，2002年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国际剑道联盟。以黑泽明导演的作品为代表的日本武戏电影，也在海外赢得了荣誉。其实不仅局限于日本，在娱乐电影的银幕上，各式各样的东方功夫武打片备受欢迎。如此这般，不一而足。

——2001年9月11日，伊斯兰激进派袭击了美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中心设施。2003年秋天，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一个节目，反映当时的冲击对纽约人造成的影响。节目开始时出现了一位曾经练习过日本武道的年轻女性。她说：“谁知道何时还会受到袭击，必须靠自身的力量防备那种野蛮的暴力。”显然，对于东洋武术的国际性关心也在发生种种变化。不少西方人是在东洋武术的身体观中，寻求克服“西洋近代思想弊端”的途径，由“坚实的肌肉”转向“柔软的运动”，由“身心的分离”趋向“身心的一体”。许多西方人进而探究以“宇宙合一”为要义的“东方思想”。

歌舞伎之类的传统艺能，也在海外渐为人知。寿司、空手道、卡拉OK、蒲团等日语成为外国语言的某种装饰，在海外的街头巷尾不时显现。禅宗、香道成为保健（healing）或生活的时尚。在美国的职业排球赛开赛前，有的球队竟有“坐禅”的仪式。近来日本的漫画和动画片也受到全世界年轻人的青睐，有人甚至说世界通俗文化的最前沿是TOKYO，且有最前沿与传统共存的美妙日本之谓。说到这些，人们的感受并不坏。日本的体育选手活跃于奥林匹克运动会、世界杯足球赛和美国的大联盟赛事上，日本人也获得了多项诺贝尔奖，人们一般的感受皆是引以为荣。

然而许多日本人在触及民族主义时，却总是联想到国家强权或“国粹主义”。日本的民族主义总是笼罩在丑恶的形象之中。而受到“大日本帝国”种种凌辱和军靴蹂躏的亚洲各国